

吉林成立地方自治会

吉林地方自治会，系由著名绅士松毓等人所发起，于 1916 年 1 月 20 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百余人。大会经投票公举松毓为会长，庆山、文禄为副会长；此外参议 10 人，并设总务、法制、文艺、会计、调查、慈善等 6 课，每课举职员 1 员。

同时，拟定了该会试办章程共 10 章，后经修改，于 1916 年 1 月 20 日，颁布了《自治会简章》，共 7 章 10 条。自治会“以预备立宪，养成公民”及准备本省地方自治为宗旨。该会《章程》规定：“本会对于本省大计关系较重者”，“得陈本省督抚或径达中央”；对地方官所办各事，该会可以上书质问，“地方官皆应答复”。

吉林地方自治会是以地方士绅和资产阶级上层为主而建立的资产阶级立宪团体。该会成立不久，入会者就已达到 200 余人。同年又成立了吉林商务总会。自治会成立后，在组织、领导国会请愿运动方面表现了很高的热情。

1916 年夏，在自治会的组织领导下，吉林绅商各界，纷纷集会演说，征集签名，组织速开国会请愿活动。他们除派出代表参加全国的联合请愿外，又联合东三省“固有团体，共同入京”，组织第一次请愿高潮。1916 年秋，吉林绅商各界爱国人士更形踊跃，“哀痛迫切”，奔走呼号，连续发出“泣血上言东三省危亡悬于眉睫，请即开国会”等上书，仅长寿县一次请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愿签名者就达三四百人。宣统元年八月，东三省又派出代表四百余人，来到京师，呈递请愿书要求明年即行召开国会。这些活动没有超出清廷“预备立宪”的范围，然而，即使这样温和的“合法斗争”，也遭到清廷的镇压和破坏。当自治会的影响扩大时，清政府竟发出布告，宣布自治会“不能认为有效”，并以“破坏政权”的“罪名”，将松毓奏参革职。这样，吉林地方自治会就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遥杨度与宪政讲习会

宪政讲习会是杨度、熊范舆等人于1907年初在日本东京创立的立宪团体，后在国内建立支部，改称宪政公会。

1907年，留学日本的杨度与熊范舆积极投入立宪运动。起初，杨拟与梁启超合组宪政会，但磋商过程中双方矛盾很大，杨度遂另立旗帜，与熊范舆组建宪政讲习会。

宪政讲习会在《总章》中规定。它的“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在《宪政讲习会意见书》中抨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是“亡我中国”之祸根，提出“设立民选议院”。1907年1月1日，杨度在日本东京创办《中国新报》月刊。作为宪政讲习会的机关报。

宪政讲习会成立时，会员不足百人，但它的能量颇大。它以《中国新报》为阵地，大造速开国会的舆论，仅1907年一年间，就连续发表百余篇有关国会方面的文章。

1907年2月1日，宪政讲习会向清廷上《民选议院请愿书》，提出三条理由，说明开设民选议院的重要性。由熊范舆、沈钧儒、恒钧、雷光宇领衔，著名者百余人。此次上书虽无结果，但它却是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声。

1907年秋，杨度因伯父病逝，从日本返国奔丧。此后，宪政讲习会便在国内进行活动，扩张势力。湖南是杨度的故乡，所以，他首先联络湖南立宪派首领谭延闿等人，在湖南成立宪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政公会。同时，分遣党徒赴各省进行扩张。第二年，又与沈钧儒在北京发起宪政公会，一时入会者纷纷涌来，发展颇为迅速。

湖南宪政会成立后。立即显示出极为活跃的态势。继熊范舆上书请开国会后，浏阳人雷光宇又以全湘士民的名义上书，呼吁召开国会。同年底，《中国新报》发表了《请开国会理由书》。第二年，以宪政公会为首的湖南立宪派又两次派代表赴北京催问都察院，请愿召开国会，揭开了全国国会请愿运动的序幕。

杨度回国后，得到考察宪政五大臣的信任，被授以四品京堂、“宪政编查馆”提调。他利用这一地位，在统治集团上层广为招纳，鼓吹速开国会。渐由立宪党领袖变成官方赞成立宪的人物。熊范舆后来被滇督李经羲召入云南，任知府。沈钧儒后来回省，任谘议局总参议。宪政公会的领袖人物相继步入官场，这个组织遂告解散。

猿摇 《中国新报》

《中国新报》于 1907 年 1 月 10 日创刊于日本东京，每月出 1 页，约 1 万字一册，1908 年 1 月 10 日停刊，先后出版九期。这个刊物以政论为主，除在东京印刷外，还出有上海版，是一份在当时很引人注目的鼓吹君主立宪的刊物。《中国新报》的撰稿人有杨度、胡茂如、熊范舆、薛大可、方表、李悦、谷钟秀等。它所刊载的《中国新报叙》、《金铁主义》、《请开国会之理由书》、《国会与地方自治》、《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代议政体论》等文章，都极力反对排满，反对民主革命，极力为君主立宪作宣传。在它看来，中国的问题“不在国体，而在政体，不争乎主，而争乎宪”，只要召开国会，实行立宪，建立“责任之政府”，就可以万事大吉。

担任《中国新报》“总编撰”的是杨度。

杨度（1875—1931）字哲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丁酉科举人。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1904 年至 1906 年两次赴日留学，在法政大学速成班学习。1906 年孙中山组织同盟会，他拒不参加，独树一帜，鼓吹立宪，并应邀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担任宪政编查馆行走，参加预备立宪的有关活动，成为君主立宪派的一员干将。辛亥革命后，他依附袁世凯，担任参议院参政，参与筹安会活动，继续为“君宪救国”作鼓吹。晚年，在经过了大半生的探索以后，他终于放弃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了君宪道路，转向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坚持党的工作，直到逝世。

早在1904年，杨度第一次到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办报活动，担任过杨笃生主编的留日学生刊物《游学译编》的编辑，是这一时期留日学生当中的报刊政论作家之一。著名的《游学译编叙》就是他的手笔。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也刊有他的诗文。杨度十分了解报纸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他在同梁启超讨论改良派报刊工作的时候，曾经表述过以下的观点，即：“先举事而后造舆论，不若先造舆论而后举事”。因此他很重视办报。1906年在湖北活动的时候，就有过在当地办报的打算，由于受到革命党人的抵制，站不住脚，没有成功。《中国新报》是他主办的第一份报纸，也是他一生中单独创办的惟一的一份报纸。

在主编《中国新报》时期，杨度为这个刊物写作了大量的政论，其中最受注意的是他的那篇《金铁主义》，这篇文章共分八个小节，连载于《中国新报》的一至六期，洋洋十四万言，是这个刊物的一篇最重要的文字。在这篇长文和他为《中国新报》所写的其他政论中，杨度极力向读者宣传他的政治观点，即：（一）金就是经济，铁就是军事，中国必须实行金铁主义，摆脱列强的羁缚，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国强民富能够争雄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二）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应该反对，但满族人也是中国人，“满洲人继汉人为中国皇帝，不为亡国”，因此不必排满；（三）“民主亦可，君主亦可”，关键在于改良政治，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实行立宪。由于中国情况特殊，各族人民需要以君主为共同的纽带，因此只能君主立宪，不能民主立宪。这就是他的关于国是的一

整套主张。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杨度虽然有爱国思想，在探索救国道路的过程中也有自己的一定见解，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反对排满、反对革命的改良派。愿望虽好，选择的道路不对，开出的方子也不行，因此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办《中国新报》的时候，杨度正在筹组政党，他的办报目的之一也是为这一政党的建立作舆论上的准备。由于改良道路不得人心，他的组党愿望未能实现，《中国新报》也办不下去，发行量一度下降到只有三百份。1905年11月，杨度以四品京堂被召入朝做官，《中国新报》也就此停刊了。

源瑶魏宗铨英勇就义

袁慰园年 月 日，革命党人魏宗铨在醴陵被捕。魏宗铨，字月辉，江西萍乡人。长大后，读书非常聪明。袁慰园年秋，魏宗铨入长沙明德学堂，结识了黄兴、禹之谟等。从此醉心革命，欲请命回萍乡起事。但不久，黄兴被捕，党人亦四处逃散，他未能如愿。次年春，魏宗铨回乡奔父丧，适逢会党首领马福益刚在长沙遇害，他的追随者想为他报仇。魏宗铨以会党可用，乃与许学生、章年一起筹划起义。许学生，湘潭人，魏宗铨旧时同学；章年亦是湖南人，又名张章年，一直有志于革命，后又易名为龚春台。魏宗铨与蔡绍南、萧克昌等，称奉孙文命，组建革命机构，灭满兴汉，举龚春台为山主，完全按照洪门组织，统率其众，内设八堂，外分八路，路设码头官以统其众，其组织遍及萍、宜、万、浏各县。袁慰园年 月，魏宗铨、蔡绍南经人介绍加入同盟会，并与东京总部接洽，请求救济军械，并指示起义日期。袁慰园年 月 日，萍、浏起义爆发，推龚春台为都督，魏宗铨任右卫都统领兼钱课督粮司。后义军终因缺乏枪械，斗不过敌人而以失败告终。清军统领袁坦于袁慰园年 月 日驻兵上栗市，派防勇搜捕魏宗铨兄弟。袁慰园年 月 日，魏宗铨到醴陵西乡邓家店，被清军探悉，捕送到醴陵县城，转解萍乡县署。魏宗铨在 猿月就义于萍乡。

秋瑾创办《中国女报》

《中国女报》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最早的一批妇女报刊之一。它的创办人、主编兼发行人是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1905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只身一人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加入共爱会、十人会、三合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从事革命活动。1906年她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底归国后，她在上海参与筹建中国公学，继而在虹口的厚德里，创立蠡城学社，作为革命联络机关。1907年春，她和陈伯平一起，借用蠡城学社社址，创办了这份《中国女报》。

《中国女报》系月刊，16开本，每期约100页，开辟有论说、演坛、译编、传记、小说、文苑、新闻、调查等栏目。自称“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女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其最主要的撰稿人是秋瑾，此外还有黄公、钝夫、燕斌、陈志群、徐寄尘、吕碧城等。

该报创刊号出版于1907年1月1日。秋瑾撰写了《发刊词》。她以十分沉痛的笔墨写道：“世间有最凄惨、最危险之二字，曰黑暗。”“今日女界之现象，固于四千年来黑暗世界中稍稍放一线光矣；然而茫茫长路，行将何之！”《中国女报》的责任就是要“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在同期上，她还用白话文写了一篇《敬告姊妹们》，更着重指出，妇女由于依赖别人生存，就只能过着“一世”囚徒和“半生”牛马的生活，失去了独立和自由，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中。怎么才能把千千万万妇女从水深火热中挽救出来呢？秋瑾认为：一切在于妇女要有志气，求得自立，要走出旧家庭的小圈子，努力学文化、学工艺、取得经济上和人格上的独立。

这年猿月源日该报第圆期出版。这一期上的文章，如黄公的《大魂篇》、吕碧城的《女子宜急结团体论》等，都强调女子不仅要进学堂、受教育，而且要争女权、结团体。秋瑾还谱写了一首《勉女权》的歌曲，歌词说：“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马牛？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侪，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这首歌曲，借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学说为思想武器，勉励中国妇女，要勇于冲决封建罗网，做国民的“女杰”！短短不到 员园 字，“须眉”气概，跃然纸上。

考虑到多数妇女缺少文化教育，阅读有困难这一事实，《中国女报》采取了“文俗之笔墨并行”的办法，使不懂得文理的妇女也大致可以浏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其文字远较同时期的其它妇女报刊为浅俗。

《中国女报》只出了两期，就因销路和资金的关系，也因秋瑾回浙从事革命活动无暇顾及而停刊了。但它所宣传的要求妇女摆脱依赖性、奋起自立、增进智识学问、负起救国责任的思想，在 圆世纪初的中国是十分先进的，在中国妇女运动中起了先驱的作用。

遥忆一代大儒溘然长逝

袁冠年 圆月 缘日，浙江大儒俞樾去世。

俞樾（~~袁冠年~~袁冠年），字荫甫，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士。咸丰二年，散馆授编修。咸丰五年，简放河南学政。咸丰七年，因御史曹登庸弹劾试题割裂，被罢职。俞樾遂乔居苏州，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等，并主持杭州访经精舍 猿 余年。授课依阮元成法。其学生有戴望、黄以周、朱一新、施补华、王治寿、冯一梅、吴承志、袁昶等，都是名噪一时之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扫荡，使得儒学典籍荡然无存。俞樾总办浙江书局，建议江浙扬鄂 源书局，分刻二十四史，又于浙局精刻子书二十二种，海内称为善本。俞樾生平专注于著述，卷帙繁富。他对于诸经皆有纂述，而以易学为深，所著易贯，专发明圣人观繁辞之义。玩易五篇，则自出新意，不拘泥先儒之说。复作艮宦易说，赴气值日考、续考、邵易补、原易、穷通变化论、互体方位说、皆足证一家之学。晚年所著《茶香室经说》，义多精确。古文不拘宗派，渊然有经籍之光。他的诗温和典雅，与白居易诗风格相近。他工于篆隶，同时如大学士曾国藩、李鸿章、尚书彭玉麟、徐树铭、潘祖荫，都倾心纳交。日本文士也来执业于他的门下。俞樾湛深经学。律己尤严，笃天性、尚廉直，布衣蔬食，海内翕然称曲园先生。袁冠年 去世，享年 愿 岁。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他一生著有《群经平议》獭卷，《诸子平议》獭卷、《第一楼丛书》、《曲园杂纂》、《俞樾杂纂》、《宾萌集》、《春在堂杂文》、《诗篇》、《词录》、《随笔》、《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丛钞》、《经说》等。共源园卷，称《春在堂全书》。

摇摇留日学生已约达 圆万人

袁国年 圆月 远日，日本政府宣布，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达 袁国圆余人。

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风气，发轫于甲午战后，至庚子义和团运动平定后，人数有显著增加。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更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赴日学习新知识的兴趣。一时间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各方面的成就，最为各省开明士绅所倾慕，留日学生人数因此急剧增加。袁国缘年，已达 袁国国；袁国正年 愿月更达 圆猿猿万人。其后因学生风潮迭起，数目略减。中国留日学生当中，或为官费生、或为自费生，官费学生中有些派自学部、商部、兵部，亦有派自各省督抚州县，尤以各省所派比率最大。不过，留日学生成份非常复杂，良莠不齐，或为青年士子，或为地方绅商，并有各省官吏。他们抵达日本后，虽分别入学各科，但就大多数程度而言，仅属入门性质。

留学生旅居日本，目睹日本在政治和经济各方面不断进步，国势蒸蒸日上，所以他们的政治意识尤浓。又因在日本得风气之先，而和国内联络又方便，声气相通，遂成为革命组织发展的温床。

梁启超创立帝国宪政会

帝国宪政会是清末海外立宪派政团，全名为中华帝国宪政会。该会由保皇会改名而来。清廷下诏预备立宪之后，康有为闻之大喜过望，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以为预备立宪与其标榜的“君民共治，满汉不分”，“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的宗旨是相符合的；“皇上日渐有权，圣躬必可无恙，从此不复劳吾同志之忧矣”，保皇会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考虑把保皇会的事情结束。1905年10月10日，他以保皇会总头领的名义，发布一篇《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同时拟订了《行庆改会简要章程》，说明所以要改名的理由和具体办法，决定改保皇会名为国民宪政会，亦称为国民宪政党，“以讲求宪法，要求进步”。

梁启超不同意用国民宪政会名称，主张把海外保皇会改为帝国宪政会，而在国内别立新会。康有为接受了这个意见，于1905年10月10日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国亦可称中华帝国宪政会。该会以梁启超、蒋智由、徐勤等为骨干。

同年10月10日至10月10日，帝国宪政会在纽约召开了各埠代表大会，康有为作了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会章。确定：以君主立宪为宗旨，“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其具体纲领为：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

1907年的故事

二十
世纪
百年
故事

该会在国内的活动是响应国内的国会请愿运动。1905年夏曾组织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帝国宪政会机构上书，要求早开国会；另外它还有一项重要活动是要求开放党禁。康、梁以国事犯而流寓海外，一直未得赦免，不能回国，始终耿耿于怀。于是从1907年起，康有为不断指示梁启超多方运动满族亲贵善耆、载泽、铁良、世续、载涛、载洵等人，开放党禁。可是由于种种阻力，其目的没有达到。

在国外，帝国宪政会开办了商务公司、华墨银行，经营商业，出版发行报刊，一方面筹措资金，资助国内的政闻社；一方面宣传立宪。由于经营涉及到个人利益、管理无方、帐目混乱，会内矛盾百出、攻讦迭起。尤其是1907年欧榘甲、梁应骊等与广西刘士骥谋商开办振华公司，因在华侨中募集股款，发生公司权归属问题，与康有为、徐勤等发生分歧，闹得不可开交，最终不得不依靠诉讼。

内部矛盾削弱了帝国宪政会的力量，革命派在海外的发展又使得一部分会员转变了立场，因此声势已不如保皇会时期之大，在立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较迅速崛起的国内立宪团体为逊色。

清廷灭亡，民国建立后，实行君主立宪已不可能。1907年圆月 23日，康有为通知各埠会员将帝国宪政会改名为国民党，后并入共和党。

俄国第二届国家杜马

1907年1月，俄国进行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考虑到革命已经低落的形势，布尔什维克重申了对杜马的策略，决定参加选举运动。

尽管沙皇政府进行了种种干预，但选举结果表明，新杜马的成份比上届更为激进。组成各党派代表是：黑帮右派 100人，十月党 100人，和平革新党、民主改革党和进步派 100人，波兰议团及其他民族地区代表 100人，立宪民主党 100人，劳动派 100人，人民社会党 100人，社会革命党 100人，社会民主党 100人。可以看出，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中派势力减弱，左派和右派均有很大加强。如果说第一届杜马是对和平道路寄予厚望的杜马，那么第二届杜马则是两极对峙、各种力量激烈斗争的杜马。这种态势使第二届杜马尚未召集便已前途维艰。斯托雷平甚至公开扬言：“我个人对杜马抱的希望很小，它不进行工作我们就把它解散。有了第二届杜马的经验，这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可怕的事了。”

同年1月14日，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幕。会议选举了立宪民主党人戈洛文为主席，劳动派代表别列金和自称属于左派的波兹南斯基为副主席，立宪民主党人切尔诺科夫为秘书长。

1月21日，斯托雷平到杜马作了政府声明。他解释了据非常立法程序颁布的土地立法、主要是1906年“十一月九日法”

的必要性，并列举了准备提交杜马审核的立法草案，如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自由，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对工人实行国家保险，实行初等义务教育等，多达一百余项。政府声明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经过辩论之后，杜马通过了转向例行事务的决议，对声明内容没有明确表态。这种沉默表明，立宪民主党立场右倾，已不敢采取任何针对政府的坚决措施。

第二届国家杜马讨论了国家预算、人身自由、监狱和废除死刑等问题，斗争最激烈的仍是土地问题。杜马决定，每周一、四的会议专门讨论土地问题，十月日正式开始。与第一届杜马相比，各个党派在土地问题上的原则性观点更明确，分歧也更尖锐。

右派和十月党支持政府的政策，认为土地问题必须按“十一月九日法”的原则解决。他们仇视私有土地强制国有化原则，坚决捍卫私有权的神圣性。立宪民主党提交的新草案比原“四十二人草案”明显倒退，其中提出，高于农民土地收成的地主土地和附属于技术工厂的土地不应强制国有，并根据原草案应完全由国家向地主支付的赔偿，大部转嫁给农民。劳动派则坚持“一百零四人草案”的立场，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表示支持，他们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布尔什维克指出，劳动派的严重错误就在于，他们不关心赎买和实现土地改革的方法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提出了真正保护农民利益的土地纲领：至少将五百万俄亩的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农民不付赎金地获得土地；建立实现土地改革所必需的国家的民主制度，特别是要按普通、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原则选出地方土地委员会。但由于孟什维克代表的错误立场，社会民主党争取农民的斗争受到损害。